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苗族史

[法] 萨维纳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族史 / (法) 萨维纳著; 立人等译.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9. 6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ISBN 978-7-81126-144-8

I. 苗… II. ①萨…②立… III. 苗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9663号

苗族史

[法] 萨维纳 著

策 划: 张三白

责任编辑: 立 道

出 版:  贵州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文艺音像出版社

设计制作:  贵阳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875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126-144-8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8292951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瓯辉—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2013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年。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于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 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用六年的时间，以每年一个专辑十本的速度，对以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 60 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08 年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其主题是苗学。因为苗族是贵州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也是有史可稽的与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多民族中的一员。为完整地体现贵州苗学的不同阶段最重要成果，我们有选择地重印了部分名著，翻译了国外研究苗族的部分重要著作，也采用了我国学者的部分优秀苗学研究的新作。

出版前言

苗族，就其人口数量言，是中国第五大民族，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苗族有 894 万人。苗族同时又是一个分布世界的民族：在东南亚各国的苗族有 200 多万人，美国有 30 万人，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共有 5 万人。苗族还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距今五六千年前，苗族先祖蚩尤就同华夏族领袖黄帝、炎帝逐鹿中原并称为中华文明三祖。千百年来，苗族因战乱所迫，迁徙无恒，最终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才找到生存之地。现今贵州的苗族有 400 多万人，约占全国苗族人口的一半。贵州是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苗族也是贵州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民族。

研究苗族和苗族文化的学问叫“苗学”，古代贵州的“苗学”文字，大多来源于地方官员，如李宗昉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田雯的《黔书》、胡宗绪的《苗疆记事》、龚柴的《苗民考》、贝青乔的《苗俗记》、徐家干的《苗疆闻见录》等。最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有清代组织的《百苗图》编绘。但上述著述大多立场偏颇，观念“正统”，又只是为“王政”或“战事”服务，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的“学（-ology）”。

运用现代学科方法而发轫的“贵州苗学”著作，来源于西方传

教士和早期人类学家，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萨维那所著的《苗族史》，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等人大量的调查报告，还有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这些著作大多产生于19世纪最后十几年至20世纪最初的20年，可以将它们看作是“贵州苗学”形成的初期阶段。换句话说，“贵州苗学”研究始于西风东渐。这使得“贵州苗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的视野。之后出现的《贵州苗族考》（1929，杨万选著）可以看作是贵州苗学研究初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抗日战争，大批大学教授和学者内迁贵州，从而促成贵州苗学研究的高潮。这一期间，贵州苗学研究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水平学者带领下的有组织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活动；二是苗族群体中出现的学者提供了“自述”的视角与研究。当年，闻一多等名教授带领的西南联大学生在贵州境内的采风；大夏大学成立了由名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徽等领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编辑了有关贵州少数民族方面的专门刊物：《大夏大学民族学论文集》、《苗夷研究丛刊》，出版发行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新谣》、《贵州苗族概论》等著作。这一时期，苗族学者已初露锋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梁聚五氏，其著有《苗夷民族发展史》；若杨汉先氏，则著有《大花苗迁入乌撒考》等；王建明氏，撰有《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等文；王建光氏，撰有《苗民的文字》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至60年代，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和民族教育院校。我国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也为配合民族自治、民族识别等工作，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为贵州苗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期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编印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了《苗族简史简志》；各民族自治的地方也编写了相关概况。大量调查中的“采风”作品也都收入《民间文学资料》得以编印流通。这一阶段，贵州苗学研究最大特色是“政府行为”——由政府组织得以实施。

“文革”期间，贵州苗学研究和其他任何社会科学一样，沦为空白。虽然，此期仍不乏罕见成果，如台江农民王安江为搜集苗族古歌的艰苦努力——他从1968年开始，行乞为命，周游各地，徒步跋涉数万里，收集整理了完整的《苗族古歌》，至今仍然是值得为之赞叹的壮举。

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文革”造成的十年空白之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重建取得了丰硕成果，贵州苗学研究也成果斐然。这期间，主要的苗学研究著作有：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杨庭硕的《百苗图研究》，翁家烈的《苗族文化论》，麻勇斌的《神性妇女研究》，杨培德的《鼓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罗庭华、余岛的《贵州苗族文化教育研究》，徐新建的《苗疆考察记》，石朝江的《中国苗学》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来自苗族内外，也来自海内外。相关的涉及苗族的研究，在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的各种视角下，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后，除了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势头，苗学研究进入到“整合”阶段，有了大部头的《苗族通史》的面世，《20世纪苗学研究百部文库》首次出版第一辑便有10部；时间跨度近百年的《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也由英、苗、汉学者共同完成；首部集可视、可听、可读的《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也由本社出版。贵州苗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本丛书第一辑将目光集中在过去百余年来贵州苗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努力保留各个时期的阶段性代表作品。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重要著作之一，萨维纳所著的《苗族史》一直未能译成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找出原书并组织了翻译；曾被称为“苗族救星”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写过《苗族纪实》，另一英国传教士克拉克著有《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此二书现合并刊行；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在1936年曾经刊行，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代表作品此次亦作再版。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末，是苗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此期间我国重要民族学者的著作中，我们选了杨万选著的《贵州苗族考》（1929）与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人的文章合为一册；苗族学者梁聚五著的《苗夷民族发展史》则更名为《苗族发展史》独立成册。

50 年代至 60 年代，因贵州民族出版社曾出有大量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我们仅选载了著名学者费孝通“劳动的苗家”与中央民族调查团的一份调查报告和调查资料合为一册，用以反映当时的调查观点和调查方法。

80 至 90 年代，是改革开放后苗学研究恢复发展的时期。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和石朝江的《中国苗学》，也是此时期成果丰硕的苗学研究的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苗学研究日趋繁荣。考虑到苗学研究的这一现状，我们选择了美国学者路易莎和台湾学者简美玲的新著，以期读者能够了解海外贵州苗学研究的趋势和前列学者的成果。

区区十册，难免挂一漏万，还望贵州苗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原宥。作为贵州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部分和成果最多的部分，“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刊行的是“苗学研究”的部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贵州苗学研究各个时期的特征和认识水平，除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谓作了删改外，尽可能保留原著原貌。另外，有些文章的著作权人一时未能联系上，为其大作早日出版，泽惠学林，不得已只好先行采用。我们恳请原作者或著作权继承者海涵原谅，并请与本社联系。

出版者

序

贵州是苗族聚居的大本营，贵州也应该是苗族研究的大本营。18 世纪下半叶以来，贵州苗学从“潜流”（未有苗学研究之名但已有苗学研究的著作）变为“洪流”（20 世纪 80 年代为“苗学”立名并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也与“藏学”一样正在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显学”。不管怎么说，贵州苗学从来就是贵州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

贵州有许多优秀的苗族学者和苗学研究著作，也有许多优秀的国际学者研究贵州苗学。这是贵州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贵州文化建设的一笔重要财富。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苗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贵州苗学重要著作的集成放在其向贵州建省 600 周年献礼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出版，感到可喜可贺。出版社同志嘱我作序，千言万语无从下笔，写下几句感言，是为序。

王朝文

（原贵州省省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苗族）

按：《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撰述者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传教士萨维纳(F.M.Savina)。《苗族史》于1924年在香港由外方传教会学会(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Etrangères)出版。

萨维纳虽然身在教会，但其学养无疑与他那时代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水平接轨。凭着自己非凡的语言天赋，和对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娴熟掌握，萨维纳对于东南亚东部的苗族和其他各种民族群体进行了尽可能清晰的分类研究。他从比较语言学角度进行的这种民族学研究，尽管时过境迁，但至今还无人超越。这正是我们在这套人类学丛书中要选进他的《苗族史》的着眼点。

本书的译者是一个集体。承当各章翻译的分别为：

第一章 肖风、梅蓉；第二章 陈 勇；第三章 安俟衡；第四章
[法]龙河丽女士(Aurélie Consulting)。

承当全书的译审及统稿工作的是立人。

序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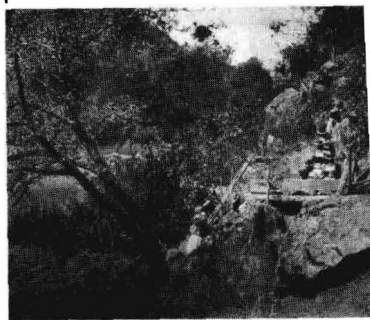
远古时期，中国就生活着一个我们今天已经遗忘了其根源的人群。他们至今仍旧生活在崇山峻岭当中，远离于别的亚洲的人群。这个群落说着一种特殊的、其他民族不知道的语言，他们身上所着的衣服尤其特别。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是看不到的。

他们的身体特点，不同于亚洲的其他族种。他们中间，男人是中等身材，而女人则都体形娇小。他们有发达的胸肌，宽厚的肩膀。大部分人鼻梁较矮，偶尔也有几个是高鼻梁的。颧骨微微突出，脸颊很宽，他们中的年轻人都是宽宽的面门，小小的嘴唇，嘴唇非常薄，眼睛边上有微微的蒙古褶，稍稍有点眯缝着眼的感觉。他们的头发是黑色或棕色的，看上去很稠密，而皮肤或浅黄色或白色，蓄很短的胡须。这个人群的相貌特征出入不大。

从他们信奉的宗教传统看，这些人有别于周围的族种群落，他们所信仰的既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也不是孔教或神道教；他们没有建立寺庙和佛像，甚至在他们的家里，也看不到宗教图像和膜拜的偶像。他们信奉的是最原始的有神教，他们保留了最初的神权崇拜，他们仍然保存着自己的生活传统。

从社会角度看，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自己特有的组织

7



沿着山溪的干河床上山的白苗妇女
摄影：P. 克鲍尔 (Kerbaol)

形式。他们生活在部落里，仅仅需要认识自己部落的头领，而且也只能在部落内部结婚。

最后，还有一个特点：这些人尚不知道主历纪年。他们在桌子上吃饭时，习惯使用汤勺而不像别的东方族群那样使用筷子。每一个成员都按一定的风格装束，这种装束成为特殊的标志，因而他们之间相互容易辨识，也同别的人自然区别开来。

这些人用“Hmong”来称呼他们自己。在远古时期的中国，他们的祖先最初曾出现在黄河下游区域和淮河流域。

“Hmong”这种自称很特殊，它的目的是显示同其他人群的区别，也有自己的骄傲含意。但外人称他们为“苗人”，那意思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或来到我们身边的田间人，或耕地人，或土著野蛮人。”

我们并不知道最初的夏族与苗人相遇的情形。那是史前时代的事了。我们同样也不太清楚，在远古时候，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如何。无论怎样，就像P. 戴遂良所说的“这里^[1]有如此美好的地方，并且林木茂密”。公元前三四千年，我们没有读到夏与苗的争端，但到了公元前2700年时，二者之间似乎不再相安无事。在这个时期，中原的夏族发展起来，苗人开始担心遭受攻击。苗人的抗争起初似乎占了上风，但在几次胜利以后，中原的夏族开始聚集在他们的首脑叫轩辕氏的周围，而苗人的首领叫做蚩尤。双方的战争以夏族的胜利告终，于是，叫轩辕的被推举为皇帝。苗人们自然不会承认轩辕氏，他们也拒绝承认他之后的尧、舜、大禹。这以后的时期，双方仍然相互斗争，战争有时在黄河流域，有时在淮河流域。

到前2000年的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苗族都一直是主要话题。中国的历史纪年表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此时期的苗族已经被流放到了黄河上游今天的陕西和甘肃一带。

而淮河流域的这部分苗族则越过了长江，朝着洞庭湖和鄱阳湖

[1] 黄河与淮河流域。——编者

方向，一路流浪，来到了今天的河北、江西和湖南，这几个省份都属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边是崇山峻岭，苗人们便在深山栖息下来。贵州就是这片山地的一部分。至此，华夏族再不能将他们驱逐得更远，于是苗人们便在这里一直生存到今天。

从贵州的大山中，苗人们一点点地向周围的地方渗透开去，他们逐步地到了广西、广东南部，也有的到了四川北部和云南西部。那些今天在北部湾驻足的苗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云南，而老挝的苗族又来自北部湾。北部湾的苗族，一部分继续往南，他们的足迹最终到达北纬二十度线附近，也就是安南^[1]山脉这儿。

中国的历史纪年也见证了苗族在中国的生存开端。但苗族的漫长迁徙之路，在历史上却没有被记载下来，尽管它历时差不多五千年。在本书的后面，我还会一再提及这个漫长的历史——鲍迪埃（Pautier）先生称之为“一个真实的历史现象”。

但是，历史总关心的是较近的东西。最古老的历史也无法复原到纪元前3千年。而3千年的这段历史如果同史前史相比较，就更是算不上什么了。本书就是想要探讨苗人从第一代居民以来的漫长的史前的存在史。

现在我们便来开始讨论我们主要的议题：重新寻找到这个民族最初的根源。

古代的华夏族首先言及苗人，但是他们并未谈到苗人的起源，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来自哪里！可以这么说，如同古人和今天的多族源研究学者所说的，即令这个民族起源依然存在，但鉴于古代种族的多样性和语言的复杂性，恐怕我们也很难解决这么一个有趣而复杂的问题了。中国的历史纪年所关系的苗族可以上推到黄帝时代。那时的苗族是华夏人的最初的敌对者。苗人让我们明确地了解，而不是猜测，他们最早与华夏族交战，战败了后者，但是这些东西却

9

[1] 现在的越南是近代（清嘉庆后）的名称，之前称“安南”。“越南”意为“南越之南”。汉代的古南越国，地域要大得多，延伸到北部湾以南。——编者